

引文格式: 朱世龙. 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路径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 (4): 12-18.

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路径

朱世龙

摘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三者叠加影响,使得本已受到严重挑战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更是遭受冲击,全球治理责任赤字、能力赤字、合法性赤字增加。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基础,外交理念契合人类对世界持久和平和普遍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国际合作实践引领塑造了新型全球治理。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需要稳定与世界的关系,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并促进自身稳定发展。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的大国地位需求,是中国的大国责任使然,是中国的大国利益决定,也是中国的大国理想追求。

关键词: 全球治理; 中国外交; 国际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

作者简介: 朱世龙,法学博士,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影响力研究”(18ZZB002)。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4.002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潮流涌现,地缘政治矛盾和风险凸显,军备竞赛、传染性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难民危机等相互交织,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挑战。而当前国际社会对上述挑战缺乏充分有效手段,全球治理存在极大赤字。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国际生活和世界事务并发挥作用,将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1],这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需要勇于承担引领责任,努力争取引领全球治理地位,实施引领行动。

一、全球治理赤字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三者叠加影响,本已受到严重挑战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更是遭受冲击,全球治理赤字增加^[2]。

第一,全球治理责任赤字。当今国际关系中存在各种各样威胁世界安全的冲突。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对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产生紧迫、现实和严重的威胁;冷战遗留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新的安全威胁却层出不穷;全球性问题严重困扰世界各国,地区性和双边性问题却又使得本来就因经济发展乏力而疲惫不堪的各国雪上加霜。所有这些问题使各国疲于应

付，苦不堪言。同时，上述各层次和各领域冲突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且治理乏力。毋庸置疑，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加以解决，因此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大国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能力、拥有更多的资源，理应多做贡献。但现实是，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甚至将全球治理工具化，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例如美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推卸治理全球、促进世界安全发展的责任，从而导致严重的全球治理责任赤字。

第二，全球治理能力赤字。全球治理是一项集体行动，需要共同行动的意愿和实际行动。这里的实际行动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传统上，我们将环境、人口、能源、粮食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随着世界的发展，原先属于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在也被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而且上述领域的相互交织嵌入，使得全球治理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多样性并存的特征。因此，全球治理需要各行为主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多样性、充足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涉及国家能力建设。在全球治理语境下，公共物品涉及提供物质资源（包括财政支出、科技手段运用、制度建设等）、进行国际动员和供给思想理念等。纵观当前全球治理现实，全球治理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形成全球治理能力赤字。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其一，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对于各国物质资源提供构成挑战。例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西方国家一方面承受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财政面临危机，再加上国内政治社会问题的困扰，使得它们无法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资源。同时，一般而言，制度建设均落后于形势发展。其二，世界多样化发展，各国对于利益存在不同诉求，使得国际动员的成本和代价日益高涨。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自身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使得国际动员和协调的难度很大。其三，各国在文化、观念、价值上存在差异，导致全球治理理念共识难以形成。比较突出的，如国际反恐领域，除了相关国家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而采取双标之外，当前世界对于恐怖主义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也是致使国际反恐合作难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原因。

第三，全球治理合法性赤字。这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不足。最为集中的体现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代表性不足和话语权不公。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主体日益多元化，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在“一个发展不均衡而又不断推进的全球化世界，其治理需要有更为广泛的国际组织和机构”^[3]，因为“这些治理主体……容易克服国家和本民族利益的局限性……它们可以灵活地采取行动，以期较快地取得实质性效果”^[4]。但现有全球治理是在美国主导下的霸权治理^[5]，无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使得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严重不公，影响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不能全面反映各国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其二，全球治理理念和价值存在分歧。尽管世界各国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设计了各种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这些制度和措施无法掩盖各国在全球治理理念、价值和路径上的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基于“美国例外论”，为了建立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国至上”，单边主义是优先选择，而这与大多数国家青睐的多边主义形成了对立，从而影响全球治理集体行动的开展和治理效果的提升。

需要是创新的基础。因而，既然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结构不能有效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冲突和全球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情势下，对全球治理进行有效引领就是一种必然。

二、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基础

引领全球治理是国家综合实力运用的一种方式,其本质是应对当前世界的发展变化,激发各国际关系行为体思想和行为的变革。作为一项对外行为,它涉及能力、意愿和行动。从目前来看,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治理的条件。

第一,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基础。引领全球治理,需要提供公共物品,这涉及成本和支出。因此,就对实力和资源等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中国拥有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人才储备丰富;拥有辽阔的地理疆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雄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效显著,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威望可以有效推动对外行动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不仅惠及了国内民生,而且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十年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①。中国经济的成功表现,也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讨论和判断^[6],尽管有些观点可能是在别有用心地制造“中国模式威胁论”^[7],但不论是“捧杀”还是真诚赞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是“软实力”。其次,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为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防范对和平的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合法性和动力。此外,中国还广泛参与了各类国际组织,尽管中国在大部分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总体不强,以跟从为主,主动作为很少^[8],但情况也在逐渐改变,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也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目前,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和股份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在上述组织中的话语分量。最后,在观念资源方面,中国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不少有益思想和做法。例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观念,被大会采纳并写入最终的决议,而且成为国际交往准则之一,直至今日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可行的思路和方案。

第二,中国外交理念契合人类对世界持久和平和普遍发展的价值追求。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中国政府就坚定地宣布,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公正、平等、互利、互信地展开对外交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努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尤其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调整,我们一直坚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宗旨。这符合推动国际关系向民主、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价值追求。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传统,例如“和谐世界”的主张,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德和伦理考量。因此,有学者将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阐述中华文明特征的演讲等同于威尔逊“让民主安存于世界”和《大西洋宪章》的道德主义宣言^[9]。事实上,全球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减少冲突,降低发展的成本,建立一种和平安全公正的国际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主张和全球治理的目标不谋而合。最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全人类前途命

^①参见: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2022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上讲话。《中央财办: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2587103106750952&wfr=spider&for=pc>。

运，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推动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同时也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建立了道义合法性。

第三，中国的国际合作实践引领塑造了新型全球治理。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10-11]。“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and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12]，即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截至2022年5月27日，中国已与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针对沿线各国经济社会的短板，创立国际机制，增加交流合作平台，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上述新型国际合作机制的代表性、有效性和公平性适应全球治理现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局面，提振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士气与信心，同时又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变革全球治理机制的现实要求，大大增强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13]。

三、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路径

在具备引领全球治理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引领行为并非水到渠成。因为引领全球治理不仅涉及意愿，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切实行动。对中国来说，有了引领全球治理的追求，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就是关键。我们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积极稳定与世界的关系^[14]。第一，稳定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鉴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美国存心阻挠或合作意愿不强，许多全球治理协议和措施根本就无法顺利执行和开展，如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的种种行为给国际经贸合作和全球治理带来的僵局和困境。毋庸讳言，因为美国的强大，它在全球的利益关切点相应地就很多，所以，全球重要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平与安全的治理基本上都绕不开美国去推行。同时，中国也是大国，在某些领域的利益追求肯定会与美国形成重叠。所以，在当前情势下，中国需要与美国稳定关系，有效管控分歧，取得共识，展开合作，从而引领全球治理。

第二，加强与其他大国合作。大国合则两利，分则受伤。大国因其体量和能力，一旦爆发冲突，则后果难以掌控和预料。客观上讲，中国要发挥引领全球治理作用，在特定的领域，可能会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利益形成冲突。如果与主要大国关系僵化，导致其强烈反弹，不仅引领全球治理目标可能受阻，更可能影响自身建设。当前，尽管某些国家实施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华全面制裁的措施会更加慎重，但不代表没有可能。毕竟，当前美西方逆全球化潮流涌现，一些人竭力鼓吹所谓与中国脱钩，并且他们确实高科技领域实施了行动。

第三，我们还要极力发展同其他国家以及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这些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力量 and 影响现在越来越不容忽视。一方面，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它们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取得他们对中国引领全球治理追求的认同，无疑会增加中国引领全球治理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或某个进程中，它们也能引领全球治理，例如新加坡就为全球治理设置议程，提供对话平台。因此，它们的动机和预期必须予以尊重，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

目标。

因此,稳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塑造中国全球治理引领者身份和认同的前提。至于通过什么方式稳定与世界的关系,庞中英认为,主要是通过多边主义,利用国际制度,因为多边协议本身就是“妥协方案”^[14],他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分析。事实上,稳定与世界的关系的具体措施还有双边机制。例如,各种双边的伙伴关系,对于稳定国际关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要对国际体系做贡献。这种贡献主要指的是公共物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现有国际机制发展完善,参与、主导国际机制建设;贡献思想观念。

第一,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约瑟夫·奈曾把国际稳定性、开放的市场、全球公地以及国际发展问题界定为美国需要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首先要做的是安全、稳定、高质量地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经济,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全球相互依赖向更深层次发展。其一,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互依赖的加深,议题联系渠道的增加,可以增进合作^[15]。其二,相互依赖的加深,可以对权力的强制性使用施加有效约束。其三,相互依赖为全球治理各行为体的互动增加了可能性。同时,相互依赖的深化,有助于降低冲突的风险,从而为维护和平创造了条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追求全球治理引领者角色本身,就是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因为,这体现了世界的变化。

第二,推动现有国际机制发展完善,参与、主导国际机制建设。如庞中英所述,组成多边机制的多边协议是妥协的产物,也即是各方同意和认可的结果。其本身就代表一种共识。现有国际机制带有很大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是历史的产物,我们承认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对之加以发展和完善,以体现公平、正义和平等,同时也满足所有对其不公感到不满的成员的期待,更符合世界发展的方向。因此,中国推动现有国际机制向完善化方向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引领全球治理的行为。具体而言,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推动旧有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分配和决策程序朝向能反映当前国际关系变化的现实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伴随着全球化的是各种新事物,对于这些新事物,要有新主张,要积极发现,积极应对。对于新生的带有全球性质的事物,全球(或多边)应对是必须的。因此,中国主导、建设性参与创建多边应对新事物的制度载体,其过程也是在引领全球治理。例如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第三,贡献思想观念。如前所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不乏思想观念的贡献,其中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一国两制”“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对于充实国际交往准则,增加国际交往实践选择,丰富国际交往基本理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且,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道德底蕴与国际关系中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平等、民主、公正等都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可以继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以丰富和发展国际交往实践,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

最后,自身繁荣稳定富强。其一,中国的繁荣和稳定是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是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其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贡献,是世界经济发展当之无愧的火车头之一。因此,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政策战略的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将影响扩散到国际社会。一个繁荣稳定强大的中国,不仅可以带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稳定地区安全和局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反之,试想一个经济衰落秩序混乱的中国,以其规模,其产生的辐射效应将会对周边地区造成怎样的震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就是对国际安全繁荣稳定的贡献,而这也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一种共生关系。另一方

面，中国领导好自身，那么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正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其二，中国自身的繁荣富强，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物品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物品需要包括财政支出、科技手段以及其他资源的稳定供应，而这对于国家实力和能力提出了要求。其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其发展思路和路径选择对于其他与中国有着类似发展需求的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对于促进上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四、余论

现阶段，中国随着整体实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已经大大提高，如何定位中国的国家身份，恐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界定。我们先前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大国，并且也一直按照这种自我体认的身份参与国际进程。这种举措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发展，全球环境的改变，中国该如何继续追求和增进国家利益，该如何继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该如何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发展，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之一，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身份定位。无须讳言，新兴大国的定位可能符合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16]。

可能有人担心，新兴大国的定位会使人想起西方历史上无休无止的新兴“修正国”对维持既有秩序的“现状国”的挑战。但是，一方面，随着世界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对于大国战争的制约因素也在增加，新兴大国不一定会以传统的战争和暴力方式挑战现有秩序。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这一身份敏感，毫无疑问，是为压制中国发展、实现自己的霸权目标而进行的观念建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正如庞中英所言，中国外交“需要改革的首先是一系列令人困惑和自相矛盾的‘不’。如果在政治和道义上站得住脚，中国应该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现状，而是去修正现状。中国即使不能修改现状，也要有修改现状的决心，争取在重建世界秩序上发挥一定作用。修正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还需要增加一个‘不’的话，那就要不隐瞒中国‘修正’现存世界秩序的意图”^[17]。所以说，在国家身份的定位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我们要理直气壮、堂堂正正、清清楚楚地宣布，言行一致，这样无疑会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有助于他国构建对中国国际身份的认同。

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该如何“修正”^①现存世界秩序呢？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引领全球治理。追求全球治理引领者地位，与中国外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指导思想并行不悖，是在新时代对“有所作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追求全球治理引领者地位并引领全球治理，对外交往就需要进行观念的演变和实践的创新。再者，中国具备了引领全球治理的条件，并且，以往的全球治理实践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需要引领全球治理。

因此，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大国地位的需求——建立合法性；这是中国的大国责任使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中国的大国利益所决定——维护主权、安全、发展；这也是中国的大国理想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事实上，从汉语字面意思来理解，“修正”一词本身不具备攻击性的内涵，而如今它之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如此令人“生畏”，一方面是观念建构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西方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强势。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426.
- [2] 任琳. “四大赤字”冲击全球治理秩序 [J]. 世界知识, 2022 (12): 14-16.
- [3] 罗伯特·基欧汉. 非均衡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M] //戴维·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 治理全球化: 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 曹荣湘, 龙虎,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83.
- [4] 李景治.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走向 [J]. 教学与研究, 2010 (12): 32-40.
- [5] 庞中英. 霸权治理与全球治理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09 (4): 16-20.
- [6] 庞中英. 惠及人类的“中国模式”远没形成 [J]. 中国与世界观察, 2009 (3/4): 182-193.
- [7] 陈向阳. 冷观对华“两论”新变调 [J]. 瞭望新闻周刊, 2011 (9): 32-33.
- [8] 李慎明, 王逸舟. 2007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9] 时殷弘. 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 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9): 18-24.
- [10] 习近平.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87-291.
- [11] 习近平. 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295.
- [12] 秦亚青, 魏玲. 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实践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18 (2): 1-14.
- [13] 陈积敏.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 [J]. 商业观察, 2018 (7): 72-75.
- [14] 庞中英. 效果不彰的多边主义和国际领导赤字: 兼论中国在国际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责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6): 4-18.
- [15]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M]. 3版.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6] 朱锋. 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求平衡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 (9): 27-28.
- [17] 庞中英.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秩序的修正者 [J]. 中国与世界观察, 2010 (1): 151-164.

On China's Leading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Zhu Shilong

Abstract: The combined impacts of profound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ve further affected th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the already severely challenged global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increased the deficits of responsibility, capacity and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As an emerging power, China should take an active part in and lead in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of strength, China's diplomatic philosoph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lasting peace and universa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China's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ve helped shape a new type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take the lead in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needs to stabilize it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make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romote its own stable development. China's leadership in global governance is inevitable, which is the demand of China's status as a major pow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as a major country, decided by China's major-country interests and the pursuit of China's ideal as a major country.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China'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ystem;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收稿日期: 2022-06-24; 责任编辑: 晏小敏)